

1901
第五十三辑

广州文史

主编 雷鸣春 副主编 杨德新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广州文史

第五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 编 雷鸣春
副主编 杨德新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谭天河 吴 裘 刘育青

封面设计:陈均生

责任技编:李穗成

广 州 文 史

第五十三辑

主编 雷鸣春 副主编 杨德新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东山影印厂

(厂址:广州寺右新马路4号大院)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插页 130,000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2733-4/K·620

定价:15.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抗日烽火

从抓笔杆子到抓枪杆子

- 回忆桂北敌后的抗日战争 罗培元(3)
- 伍观淇及其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的二三事 ... 黄明章(12)
- 日军在广州的暴行和广州人民的抗日战争 ... 方志英(17)
- 竹坑村革命史略 竹坑村党支部、村委会(30)

人物春秋

曾生的精神力量

- 过人的献身精神 罗培元(37)
- 人民的好公仆 梅日新(46)
- 他给我传来党的声音
- 怀念陈能兴同志 罗培元(52)
- 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家世考 梁伯彦 陈魏忠(58)
- 广州方言诗人符公望 林维迪(61)

陈洞庭的人物画	林维迪(69)
回忆在陶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	马恩成(73)

革命风云

强梁海盗雄兵扫	
——解放中山、珠海的回忆	何 通(85)
孙中山先生两次到江村	伍炽文(98)
广东与右江革命史	黄大健(103)

杏坛沧桑

建国初期广州市教育机构的接管与改造	黄穗生(113)
-------------------------	----------

赤子情深

真情为祖国 赤心献黄埔	古月南(123)
效祖行善的范鉴尧	王艳阳(126)
“光明使者”陈梁悦明	梁左宜(128)
功在千秋 情系桑梓	
——记郭邝肖卿女士捐资兴办邝维煜纪念中学	
的事迹	李 远(133)
广州博物馆之友——邓又同	贺钊卫(143)
港澳同胞的敬老情	曾服民(145)
著名“文化书使”——石景宜先生	李建标(149)
儿童城的福星爷书——陈伟南	

..... 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154)	
在香港大学用中文讲课的学者陈树柏	王仁宙(156)

“文革”回忆

回忆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梅日新(163)
带领红卫兵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经过	罗 进(173)

拨乱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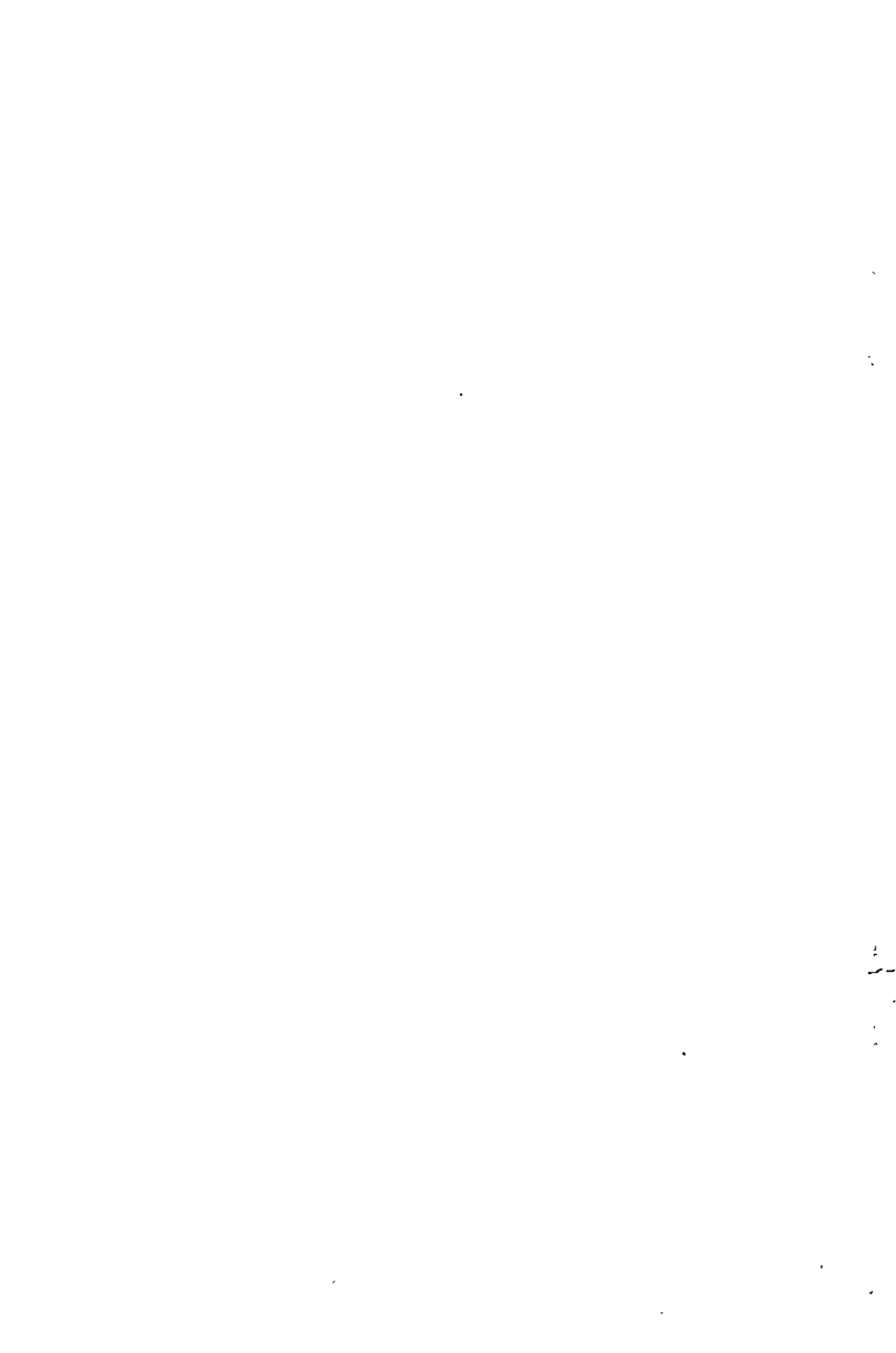
落实政策 拨乱反正

——广州市落实统战政策情况	罗 进(179)
---------------------	----------

羊城旧事

广州海角红楼始创追忆	梁世光(189)
永兴街百年沧桑记	黄曦晖(194)
陈济棠夫妇罗岗遇袭与增城救济院的来由	萧葵义(201)
民国广州娼妓述往	甄建新(203)

抗日烽火



从抓笔杆子到抓枪杆子

——回忆桂北敌后的抗日斗争

—

1942年我于中山大学毕业，从粤北到广西《柳州日报》工作，初时任编辑主任，后来取得主管该报的柳州专员尹承纲的信任和支持，任了社长。我运用尹手下缺乏笔杆子人才的机会，在两年之内，主要是从广东先后引进了当时在粤北省委受破坏后难以立足的党员二三十人和更多的进步分子到报社隐蔽下来工作，所以《柳州日报》是当时柳州地区的进步报纸，党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也不时转载或摘刊《柳州日报》的评论，其影响及于西南大后方。

1944年秋，日军为了压蒋投降和打通西南大动脉挽救南洋的败局，从湖南发动进攻，广西沦陷不可避免，我和报社的部分党员商量，决定率领员工响应《新华日报》发出的号召，到桂北敌后从事抗日斗争，但那时粤北和广西的党组织受破坏，中央命令暂停组织活动。没有党组织的联系和统一指挥，是难以打开局面的。我和总编张琛判断，在四战区任张发奎上校秘书的左洪涛和何家槐可能有党的关系，不妨大胆找他们。一天晚上我参加四战区长官部的国庆节军政联欢晚宴后，约左洪涛到柳江堤岸散

步。我说，在报社的党员打算到柳州北部敌后搞抗日武装斗争，请他为我们解决和党组织联系的问题。他说：“你们在报社有党员活动，我大体也知道，你们的决定，是符合党中央的号召的，同党组织联系问题，你们可到融县找司马文森联系，我另外通知他。”原来司马已被我们报社任为特派记者，问题就更好解决了。

日军侵陷柳州前夕，我同报社最后撤退的人员，乘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队伍的船北撤，在船上，我以报社员工在兵慌马乱的时候需要保护为由，取得尹给我们的十多枝步枪和一批手榴弹，这是我们最初掌握到的一部分武器，这也是我们党在桂北搞了千多人枪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起点。

我们到融县城，一面迅速恢复出版报纸，一面和文化支部负责人司马书记、郑思副书记联系，又和融县地方党组织的路藩、陶保恒联系。我和总编辑张琛与他们共同商定，成立桂北临时工委，作为统一领导的机构，发动和领导桂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我们报社的党员都投入党的活动和武装斗争，出版报纸的事，就由新吸收参加报社工作的翻译家周行和作家于逢等身体条件较差的同志去负责，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出版报纸的任务。

二

桂北临时工委在融县的永乐乡开的第一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广西沦陷区的情况之后，一致认为在桂北地区只要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敌伪，坚决保国、保乡、保家，一定得到群众拥护，形成日益强大的抗日武装队伍，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这是桂北工委的主要任务。在桂北工委的统一领导下，三方面的党组织都必须根据各自的条件发动群众，展开抗日武装斗争。根据毛主席关于“三大法宝”的学说，一致决定：三方面各自恢复原先所联系的党员的组织活动，过党

组织生活，发展党员；三方面党组织的内部事务，自主处理，彼此不相过问，也无须向工委报告，各自对原先的上级党组织负责，以减少暴露的可能；三方面各自利用条件和机会，协同动作，掌握武装，发动群众，组建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向沦陷区敌伪势力作斗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保卫群众利益，建立敌后游击区；三方面各自运用有利条件开展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的周围，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三方代表酝酿推举我任工委书记，我认为大家彼此了解多些再推选为好，所以没有作出决定，但后来由于我有报社掩护，同三方联络便利，报社电台每天收到延安新华社简讯，对形势能及时了解，工委开会多由我召集和主持。

在往后的斗争中证明，桂北工委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三方面的党组织斗争目标一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短期间内取得很大的成绩。

在党的组织方面，三方面都恢复组织活动，发展了组织，在桂北融县、罗城、柳城、中渡、三江、柳江几个县都有了党的领导核心。文化支部还把党的工作做到桂系流落在桂北的部队政治部去；融县地方党组织恢复特支组织，在融县附近各县开展工作；《柳州日报》社建立了特支，在活动的四个县发展了党员。这三方面的党组织在桂北敌后斗争的半年多的时间，起过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发展统一战线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重大作用。

经过改组，由党员和进步分子掌握的《柳州日报》电台，除了每日收到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外，还可以收到延安新华社发的每日简讯。这样，我们每天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讯和抗日根据地的讯息，特别是党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的党中央的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桂北工委开会，我都把收录到的延安的情况向大家汇报，所以尽管当时的工委无法和上级党委发生联系，实际上仍得到中央大政方针的领导。1945年夏天，党的七大开会时

还收到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的长篇摘要，我把这些摘要在工委一次专门会议上传达了，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为了贯彻中央七大精神，我根据会议讨论精神起草了桂北工委传达贯彻七大会议的指示，由三方面分头作统一传达，这是桂北工委会议中形成的唯一的文件。党的七大制定了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路线，大大鼓舞了桂北全体党员、进步分子和群众，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迅速发展，在斗争中发展的党员都经得起考验。桂北党的活动地区成为远近抗日爱国青年向往的中心，群众身家性命寄托的所在。在恢复党组织活动之时，有同志怀疑工委决定改变了当时中央对两广党组织停止活动的决定，是否合法，但工委认为党中央既然号召我们到沦陷区建立抗日武装斗争组织，就必然会同意我们恢复党的活动。

三

由于《柳州日报》是柳州专员公署的机关报，而它的编辑部长期以来是由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在柳州市和柳州地区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工作基础，专区十几个县、区、乡都规定要订阅《柳州日报》，所以各县自县长以下的当权派对《柳州日报》都有一定认识，所以《柳州日报》的人员到了各县，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由于专员尹承纲和我有一定特殊的关系，我于1942年夏初到《柳州日报》任编辑主任后，尹就把他要在报社发表的文章由我起草。他信任我，叫我有事可随时单独见他，我两年之间升到副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的职务，都是他亲下的手令。他把《柳州日报》当作他的得意之作。“柳报”为文反对薛党先演出“白金龙”，招张发奎的忌，张曾要我同总编辑张聚离

境，尹把我们保了下来。日军侵占柳州前夕，他要我和坚持到最后出报的员工与他同船北撤，同船的还有接任他的新专员。他接受我的建议，他当着新专员的面说了将《柳州日报》改为行署的机关报。这样提高了报社的地位，活动地区范围扩大了，报社员工在桂北行署活动的地区都取得合法身份和地位。由于这样，我们先后以保卫员工性命和报社器材为理由在尹承纲那里取得 50 多枝步枪、大批子弹和手榴弹，这是我们在武装报社职工成为以我为队长的完全由党领导的，名义上是行署直属警卫队的基础。尹还下了手令给桂北各县、区、乡，警卫队队员所到之处按实到人数发给每人每月 45 斤公粮，这是后来报社招兵买马，发展队伍的口粮和活动费用的基础。

我们和司马文森、张璨亲自出面以武装保卫报社器材和员工生命财产为由，争取了融县县长的支持，拨给一个分队的武装即 27 枝步枪、一挺轻机枪、一批子弹和手榴弹以及粮食，建立和后来发展成了完全由桂北工委领导的主力武装队伍，即融县抗日挺进队。这支队伍经过统战工作与当时融县东北一支自发的以反蒋抗日起义为号召的何平大队取得密切联系，说服何平取消反蒋口号，并接受以我们桂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的陶保恒到该部队任政治处主任的意见。挺进队在成立过程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取得地方开明士绅的支持，同县府的国民党顽固派下令交回枪枝解散该队的命令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又和受命包围解除挺进队武装的和睦联防大队队长后任县自卫总队队长的国民党军官黄君忍作说理斗争，瓦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取得独立发展。由于黄君忍是《柳州日报》的统战对象，他不仅让我们报社的警卫队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和睦镇设立警卫队办事处和报社分社，出版油印报，还包下我们在和睦活动的钱粮，答应为我们在黑市买枪械。

尹承纲的行署由罗城迁往桂东，在他的队伍告别柳州以北，

向包括行政专员、县长和桂系流落部队韦善祥团长等千余人的演说中说，他离开后，柳北地区的县政工作由专员倪仲寿负责，军事由韦善祥团长负责，宣传工作由罗培元社长负责。这等于尹交给我在桂北沦陷区活动的一把小小的尚方宝剑，也是报社人员在桂北地区的一张通行证。这样，我便在尹的授命和支持下更放手地开展统战工作。我特意和韦善祥结识，他请我便中到他部队驻地看他，“指示”宣传工作。后来我乘他自封为“镇国”纵队司令时，又和司马文森商量好建立一支政工队之后，便建议他成立政治部并任司马文森为主任。韦认为司马是《柳州日报》的特派员，我的建议出乎他的意外，也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他认为司马在文艺界有名望，肯当他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对提高他部队的威望大有好处。司马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任命桂北工委成员之一的郑思当上“镇国”政工队的队长，安插了二三十个进步青年作队员，展开群众工作和做兵运工作。这样，我们在滞留柳北一带的桂系军队中取得一个活动地盘。

柳城县县长陈为平，是我们在柳州就相熟的柳城中学校长，他思想开明，接受了我们几位地下党员张镇道、郑思、覃景秀和吕冰等人在校任教，当他被任为柳城县长后，任命张镇道为民团副司令，任命覃景秀为县府秘书主任。张、覃成了陈为平的得力助手，张指挥柳城县的民团队伍和逃难到柳城的桂林师范的党员和进步师生组成的战时服务队合作得很好。

我们报社在柳城大埔镇龙头乡、融县的和睦、罗城的黄金乡、小长安乡、龙岸乡都设有分社或分销处，这些分社和分销处的负责人同所在地的乡长、大队长建立了友谊，取得他们的支持。我们还打算向接近贵州省的宜山和宜北两县开展工作，因为该两县县长都是陆川人、我的本家，只是后来日本投降，工作来不及进行。

四

在中共桂北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有三支。它们是：融县抗日挺进队，队长是原在《柳州日报》工作的杨繁（解放后任广东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副队长是何谷（原佛山技术学校校长），政治部主任徐坚（原西大副教授、《柳州日报》评论员）；《柳州日报》警卫队，队长罗培元，负实际责任的是副队长骆维强（原《柳州日报》经理，解放后任一机部的局长），指导员陈扬（《柳州日报》成员，解放战争时改名陈光，后任桂林市委书记，在桂林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桂林七星岩前有他的纪念碑）；挺秀队，队长莫矜（原广西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后来有接受柳报特支领导的柳江县由熊柳生、石宝熙和吴裕茂三位进步青年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战斗的何平、刘子标部队。我们党员在“镇国”政工队和桂师战时服务团中各掌握步枪 10 多枝。我们桂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的张镇道，在柳城县民团副司令任内掌握的民团自卫队就更多一些，但那不属于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桂北工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活动和作战的地区包括融县、罗城、柳城、柳江和中渡五个县。融县抗日挺进队是我们当时的主力队，该队建队半年多，由于和融县群众结合得好，发展成拥有 500 多枝步枪、6 挺轻机枪、800 多兵员的远近知名的队伍。它从 1945 年 2 月起经过同日伪军大小战斗 10 多次，击毙、伤日伪军数 10 名，缴获日伪军大量物资，保卫了群众利益，所以远近知名。国民党顽固派屡次想用硬的、软的办法取消它，都给我们顶了回去。其他队伍如挺秀队、警卫队或独立作战或和其他地方抗日团队联合作战，保卫了群众利益，取得战果。在战斗中我们牺牲了军事骨干陶按才和陶察，还有三名服务队员遇难。

《柳州日报》警卫队在罗城、融县、柳城三县和日伪军占领的前沿地区活动，也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柳州日报》的分社或警卫队的办事处，这些活动据点都派有得力党员驻守，以推销报纸作掩护，一方面向地方军政人士做统战工作，另方面发动地方抗日青年参队并在群众中发展党组织。

五

正当我们党的组织活动、统一战线活动和武装斗争搞得热火朝天，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军的特务先遣部队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他们曾经于1945年夏天的一夜之间在融县县城和长安镇贴满“庆祝联合政府成立”，“毛泽东到了重庆”的标语，大放鞭炮，因为我们每天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从没有提到这些事，判断这是顽固派诱我们大暴露，一举消灭我们的圈套，便迅速要所有党组告知全体战士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暴露自己。所以顽固派的诡计没有得逞。我们也从中得出结论：国民党反动派已准备向我们开刀了，要求全体党员和武装队员更加坚决打击日伪军，和群众密切结合，迎接更艰苦的战斗。

1945年7月初，日军自广西撤退，我们沿途截击狼狈万分的日伪军之外，召开了工委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才千把人，在迎接不到王震南下部队，又不能与粤东、海南岛的抗日军队联系的情况下，无法自成局面，独立对付国民党的包围。一致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分散掩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我们的决定得到全体党员的接受，一无损失的完成了千多人枪的复员和掩护。桂北各县的人员和武装就地掩蔽，桂林文化支部的人员和《柳州日报》的党员都先后撤离广西，先到广东后到香港。后来我们三方面的党的领导各自向香港分局的领导汇报，我们在桂北的活动，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受到表扬，对我们三方

不待上级批准，自主恢复党组织活动的事是否错误的问题，方方说过：当时你们不恢复组织活动，不搞抗日武装斗争，才是错误的。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无视人民利益，悍然发动内战，我们当年千余抗日武装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或重新拿起武器，或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在柳州北部各县的原先在桂北工委领导下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员，绝大多数成了桂北解放总队的骨干，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贡献尤大。